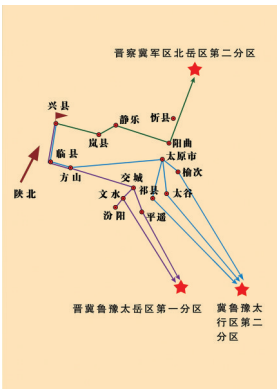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吕梁地下红色走廊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条秘密的战线，它由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所精心策划和缔造，曾为党中央与各解放区和地下党传送文件、运送物资和经费，安全护送一批批党中央领导及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陕北延安，直到顺利完成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的转移。历史上被誉为“吕梁地下红色走廊”。



晋西北三条秘密交通线示意图

1941年，日本侵略者全面进攻和扫荡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军为了破坏和割断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切断延安与各解放区的往来，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使吕梁秘密交通线处于极度困难时期。1942年1月，面对全国抗日战场形势与对敌斗争的变化，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有力保障延安途经吕梁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畅通无阻，在晋绥边区的高度重视和120师部队掩护下，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的组织侦察，利用晋西北地形地貌便于隐蔽和晋绥边区良好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开辟了北、中、南三条秘密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徐、太原（县）、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密交通线

初建吕梁秘密交通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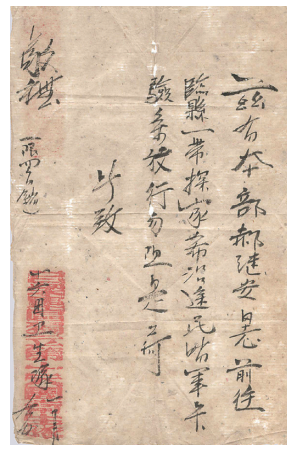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通往各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城镇被日寇占领和封锁。1938年，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粉碎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困，在毛主席亲自策划，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迅速打通和建立了从中央到各抗日根据地的秘密通道，各地方组织也相应建立党内交通专职机构和地下秘密交通线，担负起沟通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络、转运、护送等秘密工作。

在吕梁范围内，重点创建了以孝义为中心，往东经汾西、洪洞、赵城或霍县，过南同蒲铁路到晋东南，往西经隰县、永和、石楼过黄河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从1938年到1939年，孝义作为延安通往晋东南、晋察冀、华中、华东敌后抗日通道的秘密中转站，为抗战初期的秘密接转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晋西事变”后，这条交通线遭到破坏。面对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和任务，在贺龙、关向应为首的晋绥边区党委领导下，吕梁再一次创建了从文水通往晋东南的秘密交通线。为了保障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安全、保密、畅通，不仅晋西区党委在文水县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秘密交通员，而且由120师派出部队负责保卫工作，确保了我党重要领导干部往来延安，以及转运各种秘密文件和重要物资的顺利与安全。

交通站联通四面八方

交汇于吕梁兴县，再由兴县向西经黑峪口过黄河，经陕西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同时还有一条秘密国际交通线也过境吕梁，这条交通线直至解放后仍长久不为人知：它的具体线路是从延安经晋西北、大青山、外蒙库伦（今乌兰巴托）、赤塔、伊尔库斯克，到达莫斯科。这条国际交通线主要承接的是延安与莫斯科的文件往来，对接转党的干部和国际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路条（馆藏文物）

吕梁交通线功勋卓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军民舍生忘死，曾通过这几条“地下红色走廊”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接送数以万计的干部和七大代表安全到达目的地。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曾接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及党的重要干部和七大代表乃至民主人士共2852人；吕梁境内的晋绥三分区曾接送聂荣臻、彭真、罗瑞卿、程子华和联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关人员、国际友人等共计1万余人，运送延安与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重要文件、书籍、枪支、弹药、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等1000余吨；1942年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都是经由吕梁区域内的军民安全接送过境的。1948年3月，吕梁人民又保卫和护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从临县高家塔过河上岸，途经临县双塔村到达晋绥边区首府兴县11天。毛泽东同志在此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两篇光辉文献，全面阐述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总政策，及时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并指明了党的新闻工作应遵循的方针、路线和政策。1948年吕梁军民又护送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

吕梁秘密交通站，为安全保密地传递信息、情报，转运抗战物资，护送抗日干部和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为夺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战火中诞生：艰难的创刊之路

——晋绥日报社：艰苦岁月里的新闻坚守与时代担当之一

□ 袁志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事物虽已远去，但其留下的印记和精神却永远熠熠生辉，晋绥日报社便是其中之一。晋绥日报社所承载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新闻事业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壮丽篇章。

创刊背景

1940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局势动荡的年代。吕梁山区的军民处于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想要获取一点新闻资讯都极为困难。而创办一份统一的铅印报纸，更是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毅然决定创办机关报，这便是《晋绥日报》的前身——《抗战日报》。

当时的晋西北，刚刚击退阎锡山军队，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了阎锡山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成为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然而，新的根据地面临着诸多挑战。东起同蒲路北段，西至黄河，南临汾离公路，北接清水河，与大青山区相依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较为闭塞，军民的信息沟通极为不便。同时，敌后环境险恶，日军不断进行扫荡与封锁，战地分散隔离，广大领导干部、部队官兵、普通群众急切需要听到党的声音，了解各个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情况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新生的根据地也急需将党政军民对根据地建设和对日斗争的工作方针、具体办法以及抗日军民奋勇杀敌和建设根据地的伟大事迹传播出去。于是，在1940年春，中共晋西党委决定创办全区统一的铅印报纸，以替代原晋西南党委的油印机关报《五日时事》。

要在刚刚建立起的敌后根据地办报，谈何容易。晋绥军民赶走阎锡山军队后，日军又频繁进行大扫荡，整个晋西北正经历着最艰苦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日报》创刊前夕，八路军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在华北对日寇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日军加紧回师敌后，力图摧毁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绥边区根据地正处在残酷、频繁的战争中，敌我双方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边区军民常年过着艰险紧张的战斗生活。此时，整个晋西北地区物资匮乏，群众文化水平落后，办报的前期筹备工作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展开。

艰辛筹备

中共晋西区党委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采编人员紧缺。在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的主持筹备下，报社首先吸纳了《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一部分工作人员，构成了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采编队伍。紧接着，报社又开始筹措办报必需的印刷器材、纸张、油墨等等。在敌后根据地办报，印刷器材的筹备是另一项艰难的工作。根据地物资匮乏，没有出版报纸必需的印刷、通讯器材，就连纸张、油墨和办公文具也因日军的封锁而奇缺。报社工作人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占区商人，从天津、太原等敌占城市把这些东西往回运，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抗战日报》工作过的报社人员邵挺军后来回忆道：“《抗战日报》筹备和创刊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回师华北，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的时候。频繁的战争，物资和技术的缺乏，使筹备和出版报纸非常困难，我们的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购买敌人禁运的印刷器材和其他物资，高锡嘏同志就是在1940年春天到敌占区购买印刷器材，因汉奸告密，被日本鬼子刺刀杀害的。”后来，报社尽量自力更生制作各种器材和物资，如用本地产的大麻油和自己烧制的松烟制成油墨，报社还自己动手办了造麻纸的纸厂，最高日产量达到了25000张。发行报纸的同志同样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送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模范交通员李人和在文水县敌占区运送报纸，曾几次在敌人包围和追捕中，用手枪和菜刀同敌人拼杀，最后弹尽牺牲。

正式创刊

1940年9月18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抗战日报》终于在晋西北根据地正式创刊。报纸创刊号的《发刊词》明确宣布：“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便是本报的三大任务。”贺龙同志还为报纸的创刊写了“抗战日报人民呼声”的题词，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为根据地的建设再立新功。这份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犹如一颗新苗，在硝烟弥漫中艰难地孕育、成长，成为晋绥边区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并成为当时晋绥边区的一面战斗旗帜。